

对部分与鲜卑相关遗存年代的再探讨^{*}

潘 玲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130012）

东汉至魏晋时期的鲜卑遗存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部和中部、辽西、冀北和晋北地区，其中虽然可能包含有与鲜卑文化面貌相似的、或已经加入鲜卑军事联盟中的其他北方民族的遗存，但是根据目前的研究水平，还没有达到能够区分上述“鲜卑遗存”中包含的不同部族遗存的高度。因此，目前将这些具有相似文化特征的考古遗存统称为鲜卑遗存，也是比较可行的办法。鲜卑遗存的年代主要依靠随葬的来自中原的或仿照中原文化器物的年代来判断，而没有随葬源自中原器物的，则依靠与其他相关遗存的对比分析来断代。因没有直接的断代依据，上述墓葬资料的发表者难免在断代方面产生偏差。同时，在长城地带，有少量本来早于鲜卑的其他民族的墓葬，也被误认为是鲜卑所遗留。本文即选择内蒙古和吉林境内八个与鲜卑相关的遗存，对其年代做进一步的分析（本文涉及的遗存分布状况见图一）。

1. 七卡墓地

位于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旗七卡生产队的额尔古纳河东岸。墓地已经遭到破坏，大量墓葬被毁。1988年和1990年共清理了5座残墓，共清理出和征集到器物十余件，包括陶器、骨器、铁器、铜器^[1]。发掘者认为七卡墓地在扎赉诺尔和拉布达林等墓地的北面，出土器物 and 葬式较为落后，因此其年代应稍早于扎赉诺尔等墓地。扎赉诺尔墓地的年代在东汉前、中期，那么七卡墓地的年代则稍早于此。

七卡墓地征集到一件马镫衔，镫为骨质，衔为铁质，衔残存一半，镫的上部残缺。这件镫衔中的骨镫为杆形，在镫的中部有一外凸的方纽，纽内穿铁衔的外环（图二，1）。这种中部有一个外凸方纽、纽内穿衔外环的镫在汉代是绝对没有的。汉代的马镫是镫体穿在衔的外环内，在镫体上穿衔外环部位的两侧各有一个不甚外凸的圆孔，孔内穿过皮条等有机质的连接物，从而将衔的外环限制在马镫的两孔之间（图二，2）^[2]。七卡墓地征集的这件骨镫（衔）也称F形马镫，其明确的流行年代是唐代和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77001）；“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

能是仿照金属镡的形状制成的。

七卡墓地清理和征集到的十余件器物中,铜器只有一枚耳环,而铁器则有马衔、刀、鸣镝、带卡共7件,数量和种类明显多于铜器,这说明该墓地铁器使用较为广泛,年代不会太早。七卡墓地征集的铜耳环有开口,开口两端较细,至中间逐渐变粗,这一特点与十六国至北魏时期流行的耳环(图三,1)相似(详见本文第三部分)。上述铁器和铜器的情况反映出七卡墓地不只骨镡这一件器物年代较晚,该墓地存在年代在十六国或略晚时期的墓葬,应该不是个别现象。

2. 大安渔场墓地

墓地位于吉林省大安县洮儿河与嫩江汇合处的月亮泡南岸,1974年发掘14座墓葬。发掘简报根据墓葬打破汉书二期文化灰坑这一层位关系,判断墓地的年代晚于汉书二期文化,认为墓地所有墓葬是同一时期的遗存,但是没有说明墓地的年代下限^[5]。后有学者根据陶器等器物的对比分析,认为大安渔场墓地的年代可能与扎赉诺尔墓地接近或约在魏晋时期^[6]。

大安渔场墓地M214出土1件铜镡环(简报称为“铜带饰”),即固定在腰带上的带镡的下半部分(图四,3)。在河北定县北陵头(即43号汉墓)中山王墓中发现一件银质带镡,由镡板和镡环两部分组成,其中镡环的形状与大安渔场M214所出的铜镡环相似(图四,5、6)^[7]。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M102出11件骨质的镡环,轮廓基本相同,共有三种纹饰,镡环近圆形顶部向上稍外凸,中部有“凸”字形穿孔(图四,7)。这种近圆形镡环的较早形态是扎赉诺尔墓地1959年发掘墓葬中所出的一件,顶部略外凸,孔内有两个相对外卷的圆弧,两圆弧相对处几乎相连(图四,1)^[8]。拉布达林M24出的铜镡环顶部已经明显向上平凸,形成明显的可穿过与镡板连接的皮条的空间,镡环顶梁部仍残留有一段皮条(图四,2)^[9]。扎赉诺尔墓地年代在东汉前中期,拉布达林墓地与扎赉诺尔墓地年代接近,定县北陵头墓葬应是东汉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下葬的中山穆王刘畅之墓,三道湾墓地的年代在东汉晚期。根据以上镡环的形制可知,大安渔场M214的铜镡环形态应介于拉布达林和北陵头的镡环之间。但是从整体形态观察,北陵头、三道湾M102和大安渔场的镡环主体部分都明显加宽,与拉布达林M24和扎赉诺尔的较窄环体差别明显。因此,大安渔场M214所出铜镡环的年代应与北陵头和三道湾M102镡环的接近,即在东汉晚期左右^[10]。

大安渔场M214虽然没有发现镡板,但是该墓地的M207和M204都发现了铁质的镡板(简报称为“挂钩”或“铁片”),其中M207出2个基本完整的镡板和2个镡板残片(即简报称的“铁片”),沿镡板的中线近上下边缘处各有一个铁铆钉(图四,4)。三道湾墓地M123也出带铆钉的铁镡板。由以上可知,东汉晚期左右有银质、铁质的镡板,镡环有银质、铜质和骨质。身份较高的(如汉朝诸侯王)用银质带镡;北方民族普

通人则用铁质鍮板,铜质或骨质鍮环,鍮环多者有11个。可以说,东汉晚期带鍮的基本结构已经与西晋至十六国前期的较为接近(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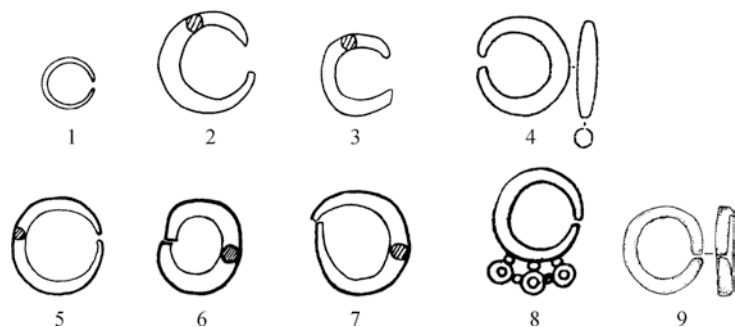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大安渔场墓地的年代应该与该墓地所出鍮环和鍮板的年代相当,即在东汉晚期左右。

3. 北玛尼吐墓地

位于兴安盟科右中旗北玛尼吐村西北,霍林河南岸,共发现墓葬123座,1991年清理了其中的26座^[11]。发掘者认为北玛尼吐墓地出土器物与六家子及哲里木盟境内的鲜卑遗存相似,陶器纹饰与舍根文化的有较大相似性,墓地年代大概在东汉初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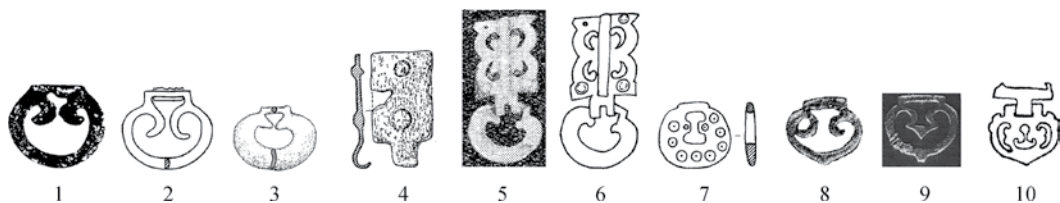
北玛尼吐墓地M5和M9各出一枚“铜包金戒指”^[12],因简报没有发表这两座墓葬的平面图,无法了解这两枚“包金戒指”的出土位置。这两枚“包金戒指”为用截面圆形的铜丝卷制成的有开口的圆环形,铜丝外包金片;近开口的两端较细,向中间逐渐变粗,直径分别为1.3厘米和1.7厘米(图三,2、3)。在东汉至十六国时期,鲜卑等北方民族的墓葬中流行带指环下葬,少者一枚,多者十枚。这种指环多数用等宽的长条形薄金属片卷制而成,也有少数用截面圆形的金属丝卷成,金属丝大多数等粗,极少见到近接口处明显变细的指环,更未见包金的指环。指环的两端大多数都相叠压或对接,没有开口,或者偶见较小的开口。北玛尼吐的这两枚“包金戒指”不仅都留出较大的开口,而且明显两端细,中间粗,形状与上述指环差别很大,但却与十六国至北魏时期北方地区流行的耳环形制非常相似。例如,大同南郊北魏墓地共有17座墓葬随葬耳环,质地有铜、银、金三种,全部为用两端细、中间粗的金属丝卷成的有开口的环形,虽然有少量耳环表面有连续的突棱纹,也有少量耳环外侧焊接小圆环或小棒形装饰物,但是耳环主体形状都没有变化,耳环直径1.3~1.9厘米(图三,5~8)^[13]。大同南郊北魏墓地随葬耳环的墓葬年代跨度较大,从发掘报告划分的第二段到第五段墓葬都有分布,年代从北魏迁都平城(公元368年)初期到北魏迁都洛阳(公元496年)以后,延续达一百余年。年代在西晋末至十六国前期的北票喇嘛洞墓地流行鎏金和包金的铜质马具以及带具和装饰品,其中耳环中也有一定比例的铜包金。虽然喇嘛洞墓地的这些包金耳环大多数铜丝粗细差别不明显,但是铜包金的工艺与北玛尼吐“包金”戒指的相同^[14](图三,9)。

北玛尼吐M5、M9所出的“包金戒指”的尺寸、形状都与大同南郊北魏墓地的耳环相似,而与东汉至十六国时期北方流行的指环相差甚远,其铜包金工艺也是十六国时期鲜卑等民族中流行的装饰品加工工艺。所以,北玛尼吐发现的两枚“包金戒指”应该是耳环不是戒指,其流行年代在十六国至北魏时期,不会早到东汉时期。除了这两枚耳环,北玛尼吐墓地所出的陶壶口沿外展,舌状圆唇,颈部内收明显(图五,1、2),在扎赉诺尔等东汉时期的鲜卑遗存中根本找不到与其相似者,但是却与朝阳十二台砖厂前燕时期墓葬^[15]、甜草沟^[16]、锦州李廐墓^[17]等早期慕容鲜卑的或前燕时期墓葬所出



图三 耳环比较

1. 七卡墓地采集 2. 北玛尼吐M5 3. 北玛尼吐M9 4. 六家子征集 5~9. 大同南郊北魏墓地
(1、5为铜质；2、3、9为铜包金；6、7为银质)



图四 鈐环和鈐板

1. 扎赉诺尔墓地铜鈐环（1959年发掘墓葬） 2. 拉布达林M24铜鈐环 3. 大安渔场M214铜鈐环 4. 大安渔场M207铁鈐板 5、6. 定县43号汉墓银带鈐（5为照片；6为孙机先生根据照片绘制的器物图） 7. 三道湾M102 8、9. 善家堡M15 10. 宜兴西晋周处墓银鈐环

陶壶形制相似（图五，3~6）。口沿外展、舌状圆唇不仅见于三燕文化的陶壶，陶罐等其他器型也有这一特征，如喇嘛洞墓地的即如此（图五，7、8）^[18]。北玛尼吐墓地有的陶壶腹部饰细密的纹饰，简报只介绍M36所出的一件陶壶“腹部饰有五周复合的水草纹”，但没有说明这种纹饰的施纹方法，器物图绘制得也较简略（图五，2）。根据器物图推测，这种“复合的水草纹”可能是一种较细密的压印纹，同类的细密压印纹是前燕前后的三燕文化陶器中流行的一种纹饰之一，常施于陶器腹部（图五，6、8）。北玛尼吐墓地发掘者认为该墓地的陶器与科右中旗六家子墓地^[19]、哲里木盟“舍根文化鲜卑遗存”^[20]所出的陶器有共同特征，这也是发掘者将墓地判定为年代上限可早到东汉初期的鲜卑墓地的主要依据。实际上六家子墓地除了个别圜底陶器，大多数遗物的年代应在西晋至十六国前期（详见本文第四部分）。“舍根文化”的陶器颈部多施纵向条状暗纹，器身饰细密的压印纹饰，陶壶的纹饰和形状与喇嘛洞等三燕文化陶壶相似，有的年代更晚，与早期契丹的陶器有较多共性^[21]。六家子和“舍根文化”遗存的年代主体在西晋至十六国前期，不会早到东汉时期。

北玛尼吐墓地的包金耳环和陶器反映出该墓地年代不仅不会早到东汉初期，而且不会早到东汉时期，主体年代应在西晋至十六国时期。该墓地骨器仅发现4件，铁器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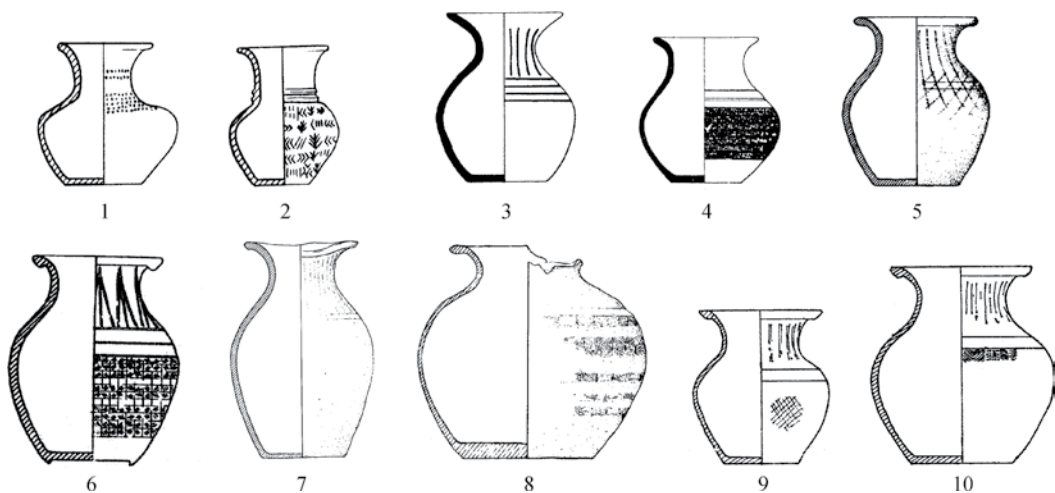
量较多,有的墓葬出十余件甚至四十余件铁器,但不见铜器,与扎赉诺尔等东汉前中期的鲜卑墓葬骨器所占比例较高的情况有明显差别,这也能够证明北玛尼吐墓地年代晚于前者。

4. 六家子墓地

六家子墓地位于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科右中旗西北部的六家子村附近,位于西辽河的支流新开河的南岸。墓地已经被破坏,资料发表者估计原有墓葬约三十座。1984年当地文物工作者对墓地进行调查,征集文物一百六十余件^[22]。墓地调查者认为六家子墓地的年代在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个别墓葬可早到东汉前期。所谓的个别墓葬,是指在墓地采集到的两件圜底陶罐,调查者认为这两件陶器不是鲜卑之物,应早到东汉前期。但是通过与相关遗存器物的综合对比可以看出,除了这两件圜底陶罐,六家子墓地调查征集的其他遗物的年代应在两晋时期,不会早到汉代,依据有以下五点。

(1) 六家子墓地征集的陶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大口展沿的陶壶,壶的颈部大多数都饰纵向的条状暗纹,腹部多饰斜方格暗纹或细密的压印纹(图五,9、10),这种陶壶的器形和纹饰与朝阳十二台营子^[23]、甜草沟墓地^[24]、锦州李庞墓葬^[25]和北票喇嘛洞墓地^[26]等地的三燕文化中期(西晋末至前燕时期)墓葬所出的陶壶相似,年代也应该相当(图五,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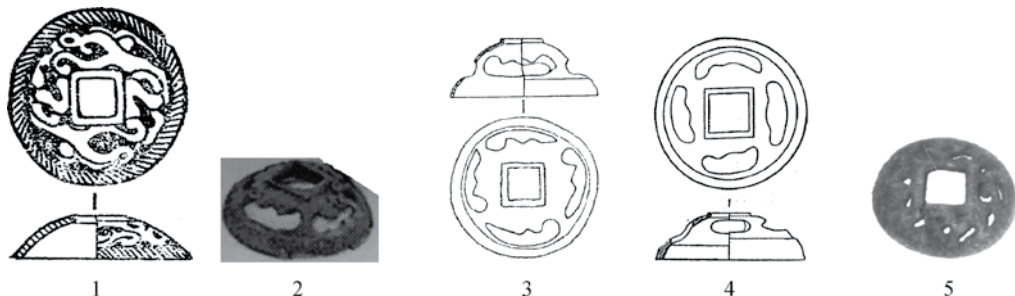
(2) 六家子墓地征集1件圆形镂空鎏金铜泡(简报称为“鎏金镂空圆形铜带饰”),近半球形,中部有一方形穿孔,表面有镂空的变形龙纹,底部边缘饰斜线纹(图六,1)。这种器物是三燕文化马带具上的一种起固定和装饰作用的器物,在朝阳十二台88M1^[27]、北票西沟村^[28]、安阳孝民屯晋墓^[29]、北票仓粮窖鲜卑墓葬^[30]



图五 陶罐

1. 北玛尼吐M14 2. 北玛尼吐M36 3. 朝阳十二台M9022 4. 朝阳十二台M8712 5. 朝阳甜草沟M2 6. 北票李庞墓
7. 北票喇嘛洞ⅡM49 8. 北票喇嘛洞ⅡM363 9、10. 六家子征集

中都发现同类器物（图六，2~5），多数是铜鎏金的，也有单纯铜质无鎏金的，直径4.5~4.9厘米，高1.5~1.9厘米，与六家子的大小接近（见表一）。上述四个地点或者是前燕或略早时期的三燕文化墓葬，或者是集中征集到大量三燕文化马具的地点（如西沟村），其中仓粮窖墓葬的2件半球形镂空铜泡表面饰镂空的双龙纹，底边饰斜线纹，与六家子所出的纹饰最相似（图七，5）。仓粮窖墓葬的年代在前燕时期或略早，六家子这件鎏金镂空铜泡的年代也应该与之相当。六家子还征集到4件鎏银的“圆形镂空铜饰件”（直径4.2厘米，高1.1厘米），简报没有发表器物图，推测这4件器物可能也是这种半球形镂空铜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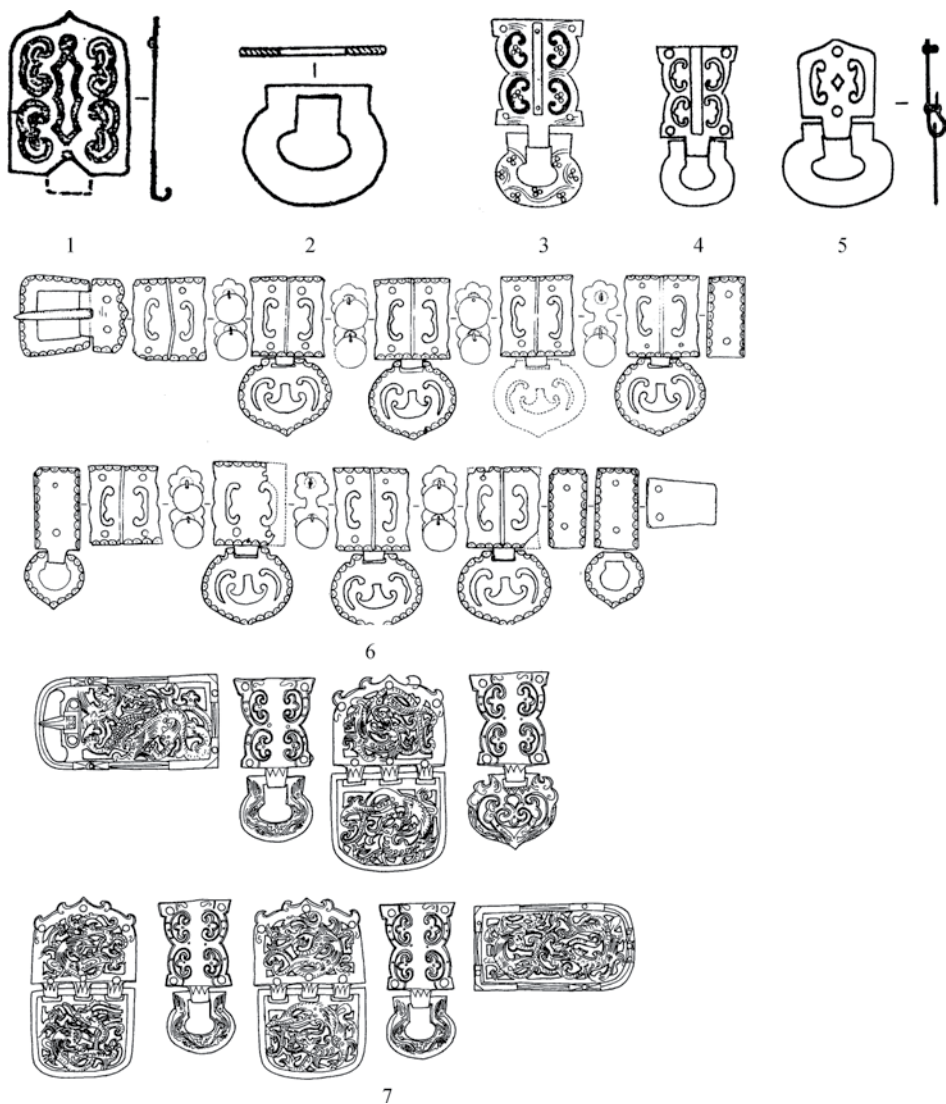
图六 半球形镂空铜泡

1. 六家子征集 2. 朝阳十二台88M1 3. 北票西沟村征集 4. 安阳孝民屯晋墓 5. 北票仓粮窖
（1~4为铜鎏金；5为铜质）

表一 圆形镂空铜泡比较表

地点	数量	质地	直径（厘米）	高（厘米）
六家子	1	铜鎏金	4.7	1.1
朝阳十二台乡88M1	1	铜鎏金	4.5	1.5
北票西沟村征集	2	铜鎏金	4.9	1.9
安阳孝民屯晋墓采集	1	铜	4.6	1.9
北票仓粮窖鲜卑墓	2	铜	不详	不详

（3）六家子墓地征集的2件“鎏金卷云纹镂空铜牌”和2件“铜带扣”实际上是腰带上的组件——带銙上的銙板和銙环两部分。“鎏金卷云纹镂空铜牌”是銙板（图七，1），用铆钉铆在腰带上，下端的卷成筒状的铜片内连接下面的銙环，即简报称的“‘凸’字形铜带扣”（图七，2）。六家子发现的2件鎏金铜銙板上饰四个两两对称的“3”字形镂空，銙环近“凸”字形，类似形状的带銙在西晋及前燕时期很流行，如西晋时期的洛阳24号晋墓（图七，3）^[31]、西晋晚期的江苏宜兴周处墓（图七，4）^[32]、十六国前期的喇嘛洞墓地ⅡM275都发现有带这种带銙的腰带^[33]（图七，7）。这些腰带具以铜鎏金质地的居多，一个腰带上的銙板和銙环的形状往往有变化，但是有成对“3”字形镂空的銙板是几乎每个腰带上都有的数量最多的銙板，“凸”字形銙环



图七 带铐(铐板和铐环)比较

1. 六家子征集鎏金铜铐板 2. 六家子征集铜铐环 3. 洛阳西晋墓M24鎏金铜带铐 4. 宜兴西晋周处墓带铐
(摘自孙机《中国古代的革带》) 5. 善家堡M9铜带铐 6. 北票喇嘛洞ⅡM196鎏金铜带具
7. 北票喇嘛洞ⅡM275鎏金铜带具

也是常见的铐环形状之一。六家子征集的铐板上的镂孔内侧有向外的双叶，这与喇嘛洞ⅡM196所出铐板上的形状相同(图七，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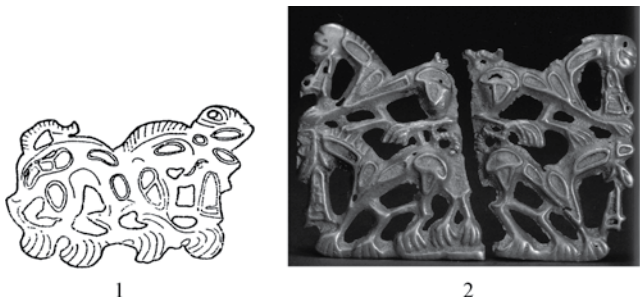
(4) 六家子墓地征集的两枚“金戒指”用金片卷成的中空圆管制成，一面开口，近开口的两端较细，至中间逐渐变粗(图三，4)，形状与本文第三部分介绍的北玛尼吐、大同南郊等墓地所出的耳环相似，在喇嘛洞墓地也发现同样形状的用金片或铜片卷成的中空圆筒制成的耳环^[34]，用金属片卷成的中空圆管制成的戒指很容易变

形，戴在经常活动的手指上并不合适，目前考古发掘没有出现过这种指环。因此，六家子的这两枚“金戒指”应该是耳环，年代约在十六国前期至北魏时期。

（5）六家子征集的1件镂空金牌饰与凉城小坝子滩出土的四兽纹金牌饰风格相同^[35]（图八，1），只不过六家子的牌饰表现的是单体动物纹，而小坝子滩的是四个动物形象组合在一起（图八，2）。小坝子滩的金牌饰背面刻有“猗狁金”三字，根据《宋书·索虏传》记载可知，猗狁是拓跋鲜卑首领猗卢的哥哥，西晋初年曾经帮助并州刺史司马腾破匈奴之围。与小坝子滩四神兽纹金牌饰同出的还有“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善中郎将”银印。很明显，小坝子滩四兽纹金牌饰的年代在西晋时期，六家子的这件兽形金牌饰的年代也应该与其相当。

除了以上六点，六家子墓地征集的金钗和银钗是两晋及十六国前期墓葬常见的随葬品，在东汉墓葬中则极少见到，六家子上述器物的形状也与这一时期所出的同类器物的相似。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六家子墓地征集的大多数陶器、金银器及铜鎏金的器物都与西晋至十六国时期北方鲜卑的或者中原和南方晋墓所出的同类器物相似，而未见与东汉时期的相似的器物。因此，六家子墓地（除了2件圜底陶罐）的年代应在西晋至十六国时期，不会早到东汉晚期。



图八 神兽纹金牌饰

1. 六家子 2. 凉城小坝子滩（牌饰中间断裂）

5. 呼和浩特钢铁厂出土铜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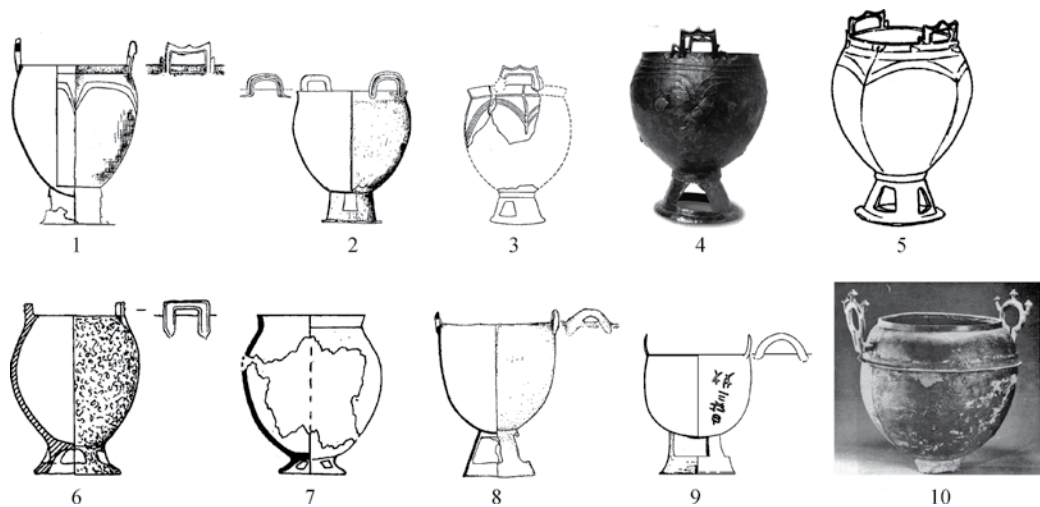
1965年，在呼和浩特市钢铁厂建筑工地发现1件镂空高圈足铜鍍，鍍器表有烟炱，腹内有牛的肢骨，此外不见其他遗迹现象和遗物。上述迹象说明呼市钢铁厂发现的这件铜鍍可能是在野外使用时因突发情况而被遗弃的，不是随葬品。资料发表者认为铜鍍的年代在北魏时期，并推测是受拓跋鲜卑统治的高车族敕勒部人所遗留^[36]。通过与两汉至北魏时期的铜鍍对比可知，这是一件典型的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前期的高圈足铜鍍。呼市钢铁厂发现的这件铜鍍为深卵形腹，圈足底部有折棱，器耳为形体相对较瘦窄的带边框的“山”字形复耳，器表装饰对称分布的四等分弧线凸纹（图九，1），相似形状的高圈足铜鍍在俄罗斯外贝加尔德列斯图依墓地M43（西汉中晚期）^[37]（图九，2）、

蒙古诺因乌拉山墓地M6(王莽至东汉前期)^[38](图九,3)、蒙古布尔干省陶勒盖墓地M63(约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前期)^[39](图九,4)、吉林榆树老河深墓地M56(王莽至东汉前期)^[40]都有发现(图九,5)。深卵形腹是这一时期高圈足鍍的主要形制,圈足上带凸棱、器耳边缘有外凸的边框也是这一时期铜鍍的共有特征。十六国前期至北魏时期的高圈足鍍有两种形制,数量最多的一种是直口筒形腹的,年代越晚腹部变得越扁而浅,圈足变得越宽大,圈足上的镂孔也相应变大(图九,8、9)^[41]。另一种是近球形鼓腹有矮领的,数量极少(图九,10)^[42]。呼和浩特市钢铁厂发现的铜鍍与十六国前期至北魏时期的高圈足鍍形制差别很大,不可能是这一时期的器物,根据形制对比可知其年代应在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前期。根据铜鍍的年代和出土地点可知,这件铜鍍应该与匈奴有关系,而与鲜卑无关。因为一直到东汉前期,鲜卑还没有迁移到内蒙古中部一带。

6. 二里半墓葬

位于内蒙古中南部的准格尔旗哈岱高勒乡窑子村二里半社,1994年村民建房时发现墓葬并将其破坏,墓葬残留的随葬品只有高圈足铁鍍和陶罐各1件。资料发表者认为二里半墓葬是北魏时期的鲜卑人墓葬^[43]。

二里半墓葬出土的铁鍍有明显的深卵形腹(图九,6),前文已经论述,有这种形状腹部的高圈足铜鍍流行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前期。二里半的这件铁鍍圈足较铜鍍的矮,这可能与材质有关。伊克昭盟补洞沟墓地M7所出的1件残铁鍍与二里半的相似,也是卵形腹,高圈足相对较矮(图九,7)^[44]。二里半的铁鍍敛口无领,与榆树老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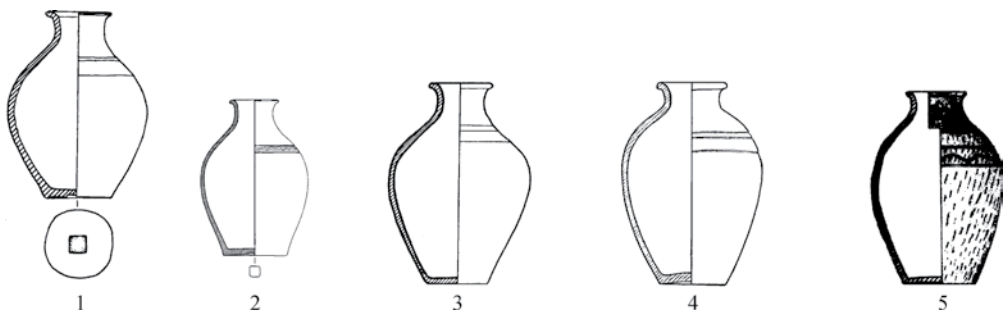


图九 铜(铁)鍍形制比较

1. 呼和浩特市钢铁厂 2. 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德列斯图依墓地M43 3. 蒙古诺音乌拉墓地M6 4. 蒙古陶勒盖墓地M63 5. 榆树老河深墓地M56 6. 二里半墓葬 7. 东胜补洞沟M7 8. 北票喇嘛洞ⅡM202 9. 大同智家堡村北魏石椁墓 10. 和林格尔另皮窑窖藏

深M56以及呼市钢铁厂所出的铜鍍口部形态相同（图九，1、5），而与十六国至北魏的高圈足鍍形态相差甚远（图九，8~10）。

二里半墓葬随葬的灰陶罐束颈，溜肩，肩部饰弦纹，罐底部正中有方形凹印痕（图一〇，1）。这种形制的陶罐在中国境内发现数量不多，见于陕西榆林大保当城址及附近的画像石墓地^[45]、准格尔大饭铺^[46]、东胜补洞沟墓地^[47]、宁夏同心李家套子墓地（图一〇，2~5）^[48]。补洞沟墓地的年代在东汉前期^[49]，大保当城址和画像石墓地的年代在西汉晚期至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之前^[50]，李家套子墓地年代在西汉末至东汉前期之间^[51]。实际上这种束颈陶罐是进入中国北方的匈奴人及其后裔所保留的本民族传统的陶器形制，在相当于东汉前期的蒙古和外贝加尔匈奴墓葬中，这种束颈陶罐是最常见的陶器形制之一。已有学者根据二里半陶罐的形制特征指出该墓是东汉时期的匈奴墓葬^[52]。补洞沟、大饭铺和二里半墓葬都位于准格尔旗及其附近，这里是东汉前期南下降汉的南匈奴王庭所在地，这三处墓葬遗存应该是这一时期刚南下不久的南匈奴人所遗留。在东汉前期，鲜卑人的足迹还没有到达长城地带中段，二里半墓葬不可能是鲜卑人的墓葬。



图一〇 匈奴陶罐

1. 二里半墓葬 2. 榆林大保当画像石墓地M16 3. 东胜补洞沟M2 4. 准格尔大饭铺M2 5. 李家套子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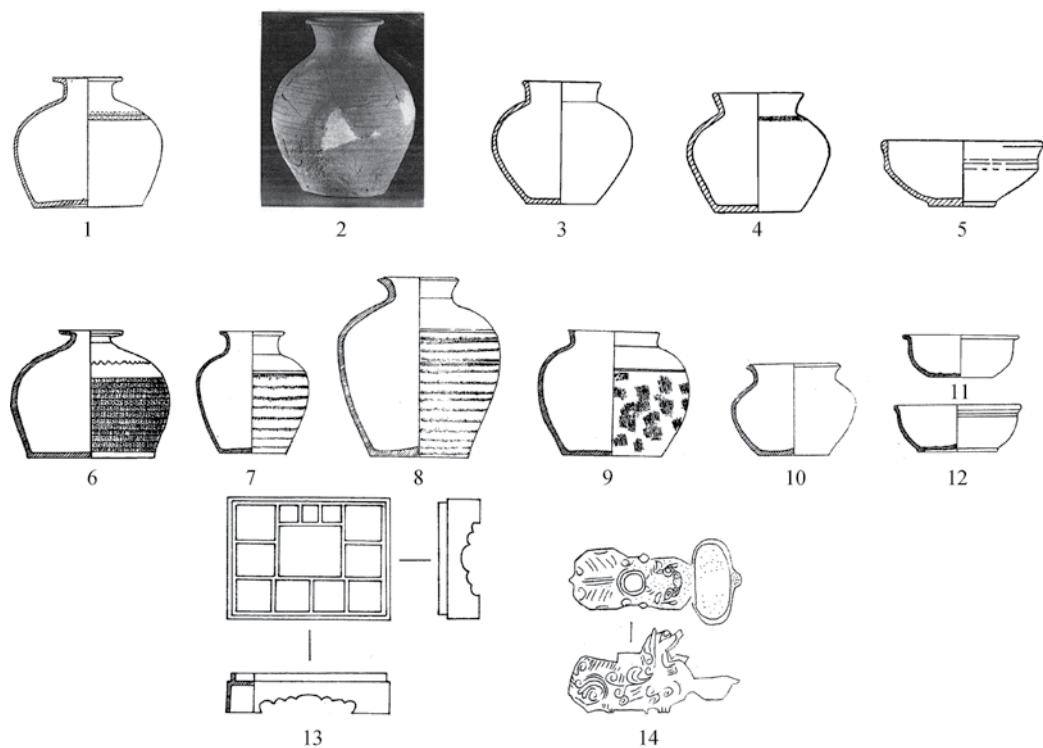
7. 善家堡墓地

善家堡墓地位于山西省北部的右玉县高墙框乡善家堡村，1990年山西省考古所在此清理23座墓葬^[53]。善家堡墓地发掘者认为该墓地的年代“上限不早于东汉后期桓、灵之际，下限约当魏晋时期”。对于墓地的年代上限，主要依据的是随葬的流行于东汉晚期的“长宜子孙”铜镜。对于墓地的年代下限，则没有提出断代依据，只是在简报结尾部分提到，根据文献记载，曹魏时期善家堡墓地所在的晋西北地区是鲜卑大人轲比能及鲜卑拓跋部的活动地域。

善家堡墓地随葬腰带具的墓葬所占比例较高，M15出土5件腰带上的铜鍱环，轮廓与东汉时期的鍱环类似，但是鍱环底部均向下突出，形成一个桃形尖（图四，8、9）。东汉时期的鍱环底部均未出现外凸的桃尖，整体均为略扁的圆环形。目前在中国境内发

现的年代明确的带桃尖鈎环最早的出自西晋末期的宜兴周处墓^[54](图四, 10), 在年代相当于西晋末至东晋早期的喇嘛洞墓地, 带桃尖的鈎环已成为比较流行的鈎环形制之一(图七, 6、7)。在善家堡M9还出4件鈎板和鈎环俱全的带鈎(图七, 5), 鈎板近方形, 顶部有平缓的突尖, 鈎板中部有一对对称的镂孔, 两个镂孔之间有两个背对的双叶的花叶造型。带成对的镂孔和背对的小花叶造型的鈎板在西晋至十六国前期很流行, 花叶有两叶的, 也有三叶的(图七, 1、3、4、6、7)。喇嘛洞墓地ⅡM196所出腰带具上的鈎板、六家子墓地出土的鈎板的镂孔内是双叶的花叶造型, 与善家堡M9鈎板上的相同。六家子所出鈎板的顶部有突尖, 与善家堡M9所出的类似。善家堡M9所出带鈎上的鈎环为“凸”字形, 本文第四部分已经分析过, 这种形状的鈎环是西晋至十六国前期流行的一种鈎环形状, 东汉时期还没有出现。因此, 善家堡墓地的上述鈎板和鈎环都具有西晋至十六国早期的形制特征。

善家堡墓地与附近同时期的其他鲜卑墓地一样, 陶器可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 夹砂陶绝大多数为鲜卑式的陶器, 而泥质陶则基本都是中原式的(图一一, 1~5)。善家堡墓地的泥质陶器中大多数与临近地区的中原文化墓葬的陶器形制相似, 而且陶器组合亦有相似之处。善家堡M4所出的扁腹束颈罐(图一一, 1), 目前普遍认为是北方地区东汉晚期汉墓中常见的器物, 实际上这种扁腹束颈罐不仅流行于东汉晚期, 也见于西晋时期的墓葬。如同在晋北地区的忻州市田村M92即随葬一件扁腹束颈罐, 墓葬资料发表者将该墓断代为东汉晚期(图一一, 6)^[55]。但是, 田村M92随葬一件带四足的方形多子盒, 这种形状的多子盒是北方地区西晋时期墓葬中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随葬器物(图一一, 13), 因此, 田村M92的年代不可能早到东汉晚期, 应该是西晋时期的墓葬。田村M92随葬三种形状的陶罐, 除了扁腹矮颈罐, 还有一种是腹部略瘦高的侈口罐, 肩部以下饰成排的细密压印纹饰(图一一, 7、8); 另一种是器身略矮的圆肩罐, 矮直颈略外侈(图一一, 9)。田村M92的上述两种陶罐在善家堡墓地都有类似者, 如善家堡M10所出的陶罐肩部以下饰成排的细密压印纹(图一一, 2), 其纹饰和器型都与田村M92所出的两种陶罐相似(图一一, 7、8)。善家堡墓地采集的一件直领圆肩罐(图一一, 3)与田村M92的直领罐类似(图一一, 9), 只不过器身没有绳纹, 下腹内收较急。田村M94与M92墓葬形制相同, 两者分布临近, 资料发表者将该墓也断代为东汉晚期。田村M94不仅与田村M92墓葬形制相同, 而且也随葬了一件具有两晋时期时代特征的器物——釉陶质地的砚滴, 为一瑞兽衔耳杯的造型, 兽的背部有一中空的圆筒(图一一, 14)。这种形制的砚滴主要见于西晋至两晋之际的墓葬, 少数见于东晋时期墓葬, 多数为铜质, 也有青瓷质地的^[56]。因此, 田村M94的年代也应为西晋时期。田村M94随葬11件陶罐, 其中8件为形制相同的肩部弧折的侈口罐(图一一, 10), 与其形状类似的泥质陶罐在善家堡墓地也存在(图一一, 4)。田村M92和M94都随葬陶碗(图一一, 11、12), 善家堡墓地的泥质陶器中除了陶罐之外也有陶碗(图一一,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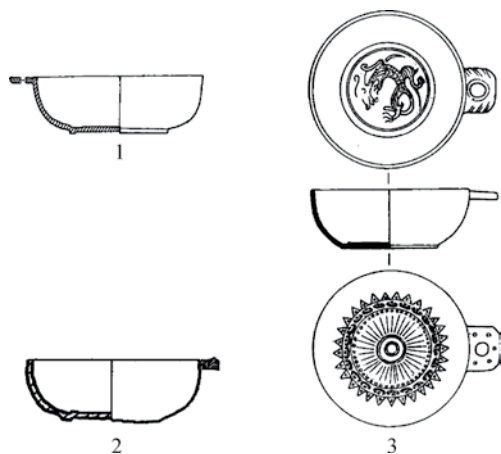
图一— 善家堡及晋北西晋墓葬出土泥质陶器及釉陶器

1~4、6~10. 陶罐（善家堡M4、善家堡M10、善家堡采集、善家堡M10、田村M92、田村M92、田村M92、田村M92、田村M92） 5、11、12. 陶碗（善家堡M4、田村M92、田村M94） 13. 多子盒（田村M92） 14. 釉陶碗滴（田村M94）

以上分析表明，善家堡墓地的腰带具与西晋至东晋早期流行的带具形制相同，泥质陶器中大多数与邻近地区西晋时期墓葬所出的陶器形制相似，器类组合也有相似之处。在善家堡墓地，随葬上述有西晋时期特征器物的墓葬有M15、M10、M9、M4、M3，这些墓葬中所随葬的鲜卑式的夹砂陶器形制与同墓地其他墓葬所出的特征相同。由此可知，善家堡墓地年代在西晋时期的墓葬数量应该不止上述5座墓葬，而是已发掘墓葬中的多数。因此，善家堡墓地的主体年代应该在西晋时期左右，或将其年代定在曹魏至西晋时期比较稳妥，东汉晚期有可能是该墓地的上限年代，但不是墓地的主体年代。

8. 东大井墓地

东大井墓地位于内蒙古中部乌兰察布盟商都县西坊子乡东大井村，该墓地被破坏，1998年清理了盗掘后残留的18座墓葬^[57]。东大井墓地的发掘资料做到了逐墓完全发表，是目前发表资料最详细全面的鲜卑墓地之一，发掘报告认为东大井墓地是东汉晚



图一二 单柄小铜杯

1. 东大井M1 2. 巩义站街西晋墓 3. 洛阳华山路西晋墓

期檀石槐大联盟时期的拓跋鲜卑墓地。

东大井M1随葬1件器形很小的单柄铜杯，柄的中部有一圆形穿孔（图一二，1），与其形制相似的单柄小铜杯见于洛阳华山路西晋墓（墓葬编号为CM2349）^[58]（图一二，3）、河南巩义站街西晋墓^[59]（图一二，2），在年代相当于西晋末至十六国早期的喇嘛洞墓地也发现同类的单柄小铜杯^[60]。上述小铜杯不仅形状相似，柄部均有圆形穿孔，而且大小接近（详见表二），这说明它们年代也应该接近。这种单柄小铜杯不见于东汉晚期墓葬。

表二 单柄小铜杯统计表

随葬单柄小铜杯的墓葬名称	口径（厘米）	底径（厘米）	器高（厘米）
东大井墓地M1	6.7	3.8	2.4
洛阳华山路西晋墓（CM2349）	7.6	3.9	2.4
河南巩义站街西晋墓	6.5	约4	2.2

河南的两座西晋墓所出的单柄小铜杯都是与两晋时期流行的其他铜器共出，墓葬的级别也较高，特别是巩义站街西晋墓所出的小铜杯底部内、外壁还铸造出精美的纹饰；喇嘛洞墓地的小铜杯也是与两晋时期流行的中原式铜容器共出。因此，这种单柄小铜杯应该属于西晋时期的中原式铜器，只不过形制比较特殊，数量也很少。东大井M1的单柄小铜杯与同墓地随葬的铜镜性质一样，都是从中原地区输入的器物，而非本地制造，因此小铜杯的年代也不会早过其在中原地区流行的年代，即不会早过西晋时期。由此可知，东大井M1的年代也应该在西晋时期，不会更早。东大井M1随葬的铜镯、有对称螺旋造型的耳饰、铁矛、连珠状铜管也见于同墓地的其他墓葬，该墓的墓葬形制及方向、随葬品摆放位置等方面也与其他墓葬特征相同。因此，东大井墓地其他墓葬的年代也应该与M1接近，即该墓地发掘的23座墓葬的年代主体应该在西晋时期前后。该墓地原有墓葬约200座，也可能墓地的年代上限会早到东汉晚期，但是已经发掘的23座墓葬年代很可能不会早到东汉。

9. 小结

以往对以上八处鲜卑墓葬遗存断代出现失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墓葬断代过分依赖陶器，忽视腰带具、马具等金属质地器物的断代作用。东北地区的四处墓地基本都属于此类情况。东汉至魏晋时期北方民族所使用的夹砂

陶器器形简单，形制变化节奏较慢，特别是鲜卑遗存特有的大口罐从东汉至魏晋时期形制变化不大，与时代特征较明显的中原系统泥质陶器没有可比性，因此用这类陶器断代往往容易出现误差，或者只能将遗存年代范围定得较大。

第二，对铜（铁）鍍这类流行年代较长的北方民族所使用器物的形制演变情况认识不全面，在没有或很少有共出器物作为断代参考依据的情况下，将两汉时期的鍍误认为属于北魏时期，呼和浩特钢铁厂和二里半墓葬都属于此类情况。

第三，将鲜卑墓葬随葬的流行年代较长的中原式器物作为主要断代依据，但往往只认识到中原式器物的最早流行年代；或者中原式器物本身断代得过早，相应的随葬这些中原式器物的鲜卑墓葬的年代也被提早。善家堡墓地、东大井墓地都属于此类情况，这两处墓地位于与中原地区临近的内蒙古中南部和晋北地区，这里的鲜卑墓葬中往往随葬中原式的铜镜、五铢钱和泥质陶器。这些铜镜和五铢钱的制造年代是东汉晚期或中晚期，但是在中原地区魏晋时期墓葬中也不少见。而且长城地带鲜卑墓葬中随葬的铜镜绝大多数是残片，是作为一种特殊的随葬品，而不是作为死者生前常用器物而随葬的。因此，不能将鲜卑墓葬中出土的铜镜和五铢钱的制造年代或其最早的流行年代等同于墓葬的年代，而应该考虑到这些器物在较晚时期仍然作为随葬品下葬这一实际情况。中原式的泥质陶器也有和上述铜镜、五铢钱类似的情况，如东汉晚期流行的扁腹陶罐在西晋时期墓葬中仍然可见。另一方面，目前对中原地区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墓葬的分期研究较薄弱，将魏晋时期墓葬年代提早到东汉晚期的情况并不鲜见，鲜卑墓葬依靠这些本身断代有误的墓葬所出中原式器物来断代，难免出现误差。

根据文献记载，在东汉晚期的顺帝后期，鲜卑首领檀石槐的庭帐设在高柳北三百里处，位置相当于今内蒙古中南部的察右后旗附近地区。此后的桓帝、灵帝时期（公元147~188年），鲜卑各部结成以檀石槐为首的军事联盟，频繁抄略幽、并州的沿边诸郡。曹魏时期，已经有投降曹魏政权的鲜卑步度根等部入居并州的雁门郡、太原郡，轲比能部在上谷郡、代郡及并州北面的近边地带活动^[61]。可以说，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在汉云中、雁门和代郡以北地区是鲜卑的活动中心区域，这里正是今内蒙古中南部集宁市附近的察右后、察右前旗和商都县一带，也有少数鲜卑部众迁入今晋北地区。西晋初年，鲜卑拓跋部已经有大批人众集中分布在汉时的云中郡一带（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附近地区）。西晋后期，鲜卑拓跋部迁入雁门郡（即今晋北地区），成为当时西晋并州刺史所赖以控制边疆的一个重要军事外援^[62]。上述文献记载说明，从东汉晚期到西晋时期，从檀石槐到轲比能再到拓跋部，鲜卑诸部从内蒙古中南部逐渐向南发展，从边郡以北南下到云中郡、雁门郡、代郡。因此，现今在上述地区发现的鲜卑遗存，应该能够从东汉晚期延续到西晋时期。以往在内蒙古中南部和晋北地区发现的鲜卑遗存的断代年代有两个集中的时段，即一大批是东汉晚期，另一大批是以大同为中心的拓跋鲜卑定都平城之前（相当于东晋时期）至北魏时期的遗

存,两大段之间的曹魏至西晋时期的遗存则基本不见或无法明确区分。本文的研究已经证明善家堡和东大井墓地主体年代在西晋时期,这说明在曹魏至西晋时期,在内蒙古中南部和晋北地区确实有鲜卑遗存存在,只不过我们过去普遍断代过早,将它们的年代断定为东汉晚期,或者主体年代在东汉晚期。

在内蒙古中南部和晋北地区,有不少被认定为东汉晚期的鲜卑墓地都与东大井和善家堡墓地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这一地区东汉晚期以后到西晋时期的鲜卑遗存应该不在少数,对这些遗存有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甄别和研究。

附记:本文部分内容的英文稿曾提交给2011年8月在蒙古乌兰巴托召开的“纪念匈奴帝国建立2220周年——匈奴帝国和古代蒙古史研究”国际会议,由本文作者在会议上对论文内容作简要介绍,该英文稿原计划在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中发表。

注 释

- [1]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额尔古纳右旗七卡鲜卑墓清理简报 [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 [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457~460.
- [2]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 [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72,图六五,1.
- [3] a.冯恩学.辽代契丹马具探索 [A].考古学集刊(第14集) [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441~464.
b.敖汉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大横沟辽墓 [J].考古,1987(10): 889~904.
c.陕西省文管会.长安县南里王村唐韦洞墓发掘记 [J].文物,1959(8): 8~18.
- [4] a.田立坤,李智.朝阳发现的三燕文化遗物及相关问题 [J].文物,1984(11): 20~32.
b.田立坤.关于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的几个问题 [A].辽宁考古文集 [C].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263~267.
- [5] 吉林省博物馆文物队,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大安渔场古代墓地 [J].考古,1975(6): 356~362.
- [6] 杨晶.吉林大安渔场墓地的时代与族属 [J].考古与文物,1988(4): 33~7.
- [7] 定县博物馆.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 [J].文物,1973(11): 8~20.
- [8] 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 [J].文物,1961(9): 16~19.
- [9]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 [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 [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384~396.
- [10] 日本学者町田章在2006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过与本文接近的关于东汉跨环演变的认识.见町田章.鲜卑的金属带具 [A].东北亚考古学论丛 [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155~168 (根据作者2006年发表的日文原文翻译).

- [11] 钱玉成, 孟建仁. 科右中旗北玛尼吐鲜卑墓群 [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一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397~406.
- [12] 《科右中旗北玛尼吐鲜卑墓群》的墓葬登记表中记录M5和M9各出2枚戒指, 根据该文正文内容介绍可知, M9出的1枚为包金铜戒指, 1枚为红铜卷制成的戒指; M5出的1枚为铜包金戒指, 另1枚戒指在正文中没有提及, 情况不明.
- [13]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大同市博物馆.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 [1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朝阳市博物馆, 北票文物管理所.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 [J]. 考古学报, 2004 (2): 209~241.
- [1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朝阳王子坟山墓群1987年、1990年度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 [J]. 文物, 1997 (11): 4~18.
- [1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朝阳市博物馆, 朝阳县文物管理所. 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 [J]. 文物, 1997 (11): 33~41.
- [17] 辛发, 鲁宝林, 吴鹏. 锦州前燕李廆墓清理简报 [J]. 文物, 1995 (6): 42~46.
- [18] 同 [14].
- [19] 张柏忠. 内蒙古科右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 [J]. 考古, 1989 (5): 430~438.
- [20] 张柏忠. 哲里木盟发现的鲜卑遗存 [J]. 文物, 1981 (2): 9~14.
- [21] 乔梁. 契丹陶器的编年 [J]. 北方文物, 2007 (1): 33~43.
- [22] 同 [19].
- [23] 同 [15].
- [24] 同 [16].
- [25] 同 [17].
- [26] 同 [14].
- [2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朝阳市博物馆. 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 [J]. 文物, 1997 (11): 19~32.
- 该简报没有发表圆形镂空铜泡的器物图, 本文图六, 2来源如下:
- 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 中国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东アジア考古学论丛 [C]. 日本奈良: 奈良文化财研究所, 2006: 图版1.
- [28] 同 [4].
-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 [J]. 考古, 1983 (6): 501~511.
- [30] 孙国平, 李智. 辽宁北票仓粮窖鲜卑墓 [J]. 文物, 1994 (11): 38~42.
- 该简报只发表了圆形镂空铜泡的照片, 但是较模糊. 本文图六, 5来源如下:
- 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 中国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东アジア考古学论丛 [C]. 日本奈良: 奈良文化财研究所, 2006: 图版8, 4.

- [3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 洛阳晋墓的发掘[J]. 考古学报, 1957(1): 169~185.
- [32] 罗宗真. 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57(4): 81~42.
(本文的周处墓所出银带銙器物线图摘自孙机. 我国古代的革带[A]. 考古与文物论集[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图八, 6.)
- [3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燕文物精粹[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2: 70~71, 图71、图72.
- [34] 同[33], 42, 图21.
- [35] 陈万雄, 赵芳志. 草原文化[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1996: 128, 图144.
- [36] 陆思贤. 土默川平原上的北魏铜鍍[A]. 呼和浩特文物(第二期)[C]. 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市文物管理处, 1991: 14~16.
- [37] Миняев С. С. *Дырестуй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дом, 1998.
- [38] Руденко С. И. Культура хуннов и ноинулинские курганы[A].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C]. с.36. Рис. 29, б.
- [39] ШУА-и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Хүрээлэн, Моголын Үндэсний Музей, Солонгосын Үндэсний Музей. Дуурлиг нарсны хүннү булш[A]. *Солонгосын Үндэсний Музей*[C]. 2009: с. 32.
- [40] 同[2], 72, 图六五, 1.
- [41] a. 同[33], 73, 图77.
b. 王银田, 刘俊喜.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J]. 文物, 2001(7): 40~51.
- [42]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和林格尔县文化馆. 和林格尔县另皮窑村北魏墓出土的金器[J]. 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三期), 1984: 52~54. (本文的铜鍍彩图选自本文注[35], 图157.)
- [43] 魏坚. 准格尔旗二里半墓葬[A].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205~207.
- [44] 伊盟文物工作站. 伊克昭盟补洞沟匈奴墓清理简报[J]. 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 1981: 27~33.
- [45]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神木大保当[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4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内蒙古准格尔旗煤田黑岱沟矿区文物普查述要[J]. 考古, 1990(1): 1~11.
- [47] 同[44].
- [48]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同心县文管所. 宁夏同心县李家套子匈奴墓清理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88(3): 17~20.
- [49] a. 林沅. 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 内蒙古文物考古[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3(1、2): 127~141.
b. 潘玲. 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 [50] 同[47].
- [51] 同[49]b.
- [52] 乔梁. 鄂尔多斯的鲜卑遗存[A]. 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467~475.
- [53] 王克林, 宁立新, 孙春林. 山西省右玉县善家堡墓地[J]. 文物季刊, 1992(4): 1~21.
- [54] 罗宗真. 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57(2): 83~106.
本文使用的周处墓所出鍮环器物线图摘自孙机先生的论文插图(见孙机. 我国古代的革带[A]. 考古与文物论集[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215).
- [55] 忻州市文物管理处. 忻州市田村东汉墓发掘简报[A]. 三晋考古(第三辑)[C].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6: 250~256.
- [56] a. 南京市博物馆. 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J]. 文物, 2001(3): 4~40, 图一七.
b.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河南巩义站街晋墓[J]. 文物, 2002(11): 39~53, 图三.
c.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临沂市文化局. 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J]. 文物, 2007(7): 4~37, 图七七.
d. 焦作市文物工作队. 河南焦作山阳北路西晋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11(9): 58~66, 图一八.
- [57] 李兴盛, 魏坚. 商都县东大井墓地[A].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55~102.
- [58]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洛阳华山路西晋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06(12): 18~31, 图三〇, 6.
- [59] 同[56]b.
- [60] 喇嘛洞墓地的单柄小铜杯资料没有发表, 是笔者参加喇嘛洞墓地发掘资料整理工作时所见.
- [61] (晋)陈寿. 三国志·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835~841(含裴松之的注).
- [62] (南朝·宋)沈约. 宋书·索虏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2321.

A Reanalysis of the Date of Some Relics Related to Xianbei

Pan Ling

Basing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seven tomb remains and one unearthed article which have relation with Xianbei, the author date them afresh. There are tombs of approximately Former Yan Period or slightly later period in Qika cemetery. The date of

Da'an fishery cemetery is the late stage of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date of Beimanitu cemetery is from the late stage of Western Jin Dynasty to Sixteen States Period. The Liujiazi cemetery shares the same date with the early stage remains of Three Yan Culture, namely, from the late stage of Western Jin Dynasty to Former Yan Period. The bronze *fu* (cauldron) unearthed from Huhehaote steelworks is an vessel dating from middle and late stage of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former stage of Eastern Han Dynasty, it have relation with Xiongnu. The Erliban tomb in Zhungeer was left by southern Xiongnu, and the date of it is the earlier stage of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main date of Shanjiabao cemetery and Dongdajing cemetery is Western Jin Dynasty, or from Wei Period to Western Jin Dynasty.